



天一阁与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发展

□ 李开升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特色之一是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字及承载文字的典籍体系。古籍文化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天一阁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藏书是中国古籍文化的优秀代表。书楼俱存、书楼同在，是天一阁作为藏书文化遗存独一无二的特点，象征着中国古籍文化乃至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天一阁是明代书籍文化的活标本，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历史遗存。

历史上，天一阁曾为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早在天一阁创始人范钦时期，明代学者俞允就曾向范钦借其所藏洪武时期三科的登科录，用来编纂科举学经典《皇明进士登科考》。经史学家黄宗羲曾登楼访书，编纂了有明一代重要文献《明文案》《明文海》。史学家全祖望多次来天一阁查阅书籍和碑帖，写下了《鮑埼亭文集》中不朽的文章。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范氏天一阁进呈藏书600余部，为全国最多的四大藏书家之一，乾隆皇帝为奖励范氏助修之功，回赠《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图》铜版画两套和《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清道光时期，福建省编纂《福建通志》，从天一阁借抄福建地方文献50余种。天一阁藏书楼建筑也成为诸多官私藏书楼的取法对象。如著名的“四库七阁”（北方的故宫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南方的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就是仿照天一阁建成。其他像宁波本地的卢氏抱经楼、南京甘氏津逮楼、扬州吴氏测海楼等藏书楼均是模仿天一阁而建。可以说在清中叶以后，天一阁已成为天下藏书楼的典范，是中国书籍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天一阁对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发展作用得到更多体现。国家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古物陈列所、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在天一阁成立，一方面天一阁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天一阁因其重要历史文化价值而成为宁波市的文物管理工作的代表。宁波市包括古籍在内的众多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都在天一阁中进行，而其中的古籍工作最为突出。1960年代，国家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斥资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107种编为《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出版，是当时全国少有的大型古籍影印项目，大大推进了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利用、研究和发展（目前天一阁所藏方志类古籍全

部影印出版）。此后，天一阁陆续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8年）、第一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09年）、国家一级博物馆（2020年），在文物、博物馆、古籍和古籍修复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等级，天一阁的古籍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得到了最好的制度保障。

中华文明作为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其基本载体就是数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华典籍。天一阁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最能体现中国古籍文化这一连续不断的传承精神。从范钦创立天一阁，到其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定下一天一阁由子孙共同管理的制度，即所谓“代不分书”；曾孙范光文为天一阁增构池亭、补充藏书；曾孙范光燮维修天一阁，引导大学者黄宗羲登楼观书，并为嘉兴府学抄录天一阁藏书百余部；八世孙范懋柱守阁有方，进呈藏书助修《四库全书》；十世孙范邦甸等编成《天一阁书目》刊行；十世孙范邦绶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联合族人设法追回被盗藏书；十二世孙范玉森、范盈熹在民国初年奔走官府抓获盗书贼；十三世孙范鹿其参加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率领族人和社会各界合作保护天一阁及其藏书，并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天一阁藏书转移到浙南龙泉县、庆元县保管，终使藏书不失，典籍重光。自范钦至范鹿其，天一阁藏书传承十三代，历经400余年的风风雨雨，其间经受无数战争、动乱，阁书几度遭劫，在范氏诸位杰出后人的艰辛守护和无数不知名族人的默默奉献之下，终于书阁俱存，岿然立于浙东。藏书世家这种艰苦卓绝的传承和守护精神正是中华典籍绵延不绝、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天一阁不仅以中国现存最古老且书楼俱存的藏书楼这一独一无二的特征成为中国古籍文化传承发展的杰出代表，而且其所藏古籍也具有重要的、独特的价值。早在1930年代，当时版本目录学的新进、后来成为一代大家的赵万里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一文中指出，“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料”，这句话简单直接地点明了天一阁藏书的巨大价值也是最重要特色。如天一阁原有明代地方志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现存271种，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孤本。又如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录370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孤本，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所藏明代科举录，大半也是天一阁流散之书。还有明代政治制度类书籍如《船政》《刘东山招由》《武定侯郭勋劄记》等，也都是孤本。这些重要的珍贵文献，包括前面提到的地方志，天一阁已陆续整理影印出版。

赵万里这句话表面上主要是从“史料”的角度讲的，也就是主要侧重文献内容；而实际上对于天一阁藏书的实物价值，他也有相当的认识，只是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天一阁藏书保藏阁中400多年，实物形态几乎未曾受到系统的改变，如同一个考古发现的宝藏，其文物的原真性在现存古籍中是极其罕见的，唯一能与之媲美的大概是书籍装订工艺的重要进步，现存明代中叶以前的古籍之所以大多数是线装，多是后世改装的结果。

天一阁对于中国古籍文化传承发展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改变了中国古籍收藏、尤其是善本收藏的格局。根据目前收录中国大陆藏善本最权威的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收藏善本最多的十家机构依次分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这10家藏书机构分布在5个城市，除了京沪两个直辖市，就是江浙两省省会南京和杭州，非直辖市、非省会的只有宁波，也就是天一阁所在地。天一阁以其独特的存在使海滨小城宁波跻身拥有善本收藏前十机构的城市。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文化兴国、文化强族的必由之路。古籍是传统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天一阁是古籍文化的重要象征。加强天一阁研究、开发天一阁及其藏书蕴含的重要文化价值，是推动中国古籍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然选择。



□ 洪正畅

2022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告诫年轻干部要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古人讲：‘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一古代箴言，旨在要求年轻干部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如此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语出北宋苏辙《上皇帝书》。苏辙一生心系天下，勤政务实，博览诸子百家，尤尊孟子思想，十分擅长史论和政论。《上皇帝书》是苏辙上书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提出意见的一篇政论文章。苏辙在劝谏神宗精兵简政时提出，筹定规划、主持大局必须把握简明的总纲驾驭纷繁的事务，而把握简明的总纲就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这就必须做到“心不可乱”，随后提出了“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这句箴言。这句箴言的大意是说，心正才能心境平和、头脑清醒，有利之事发生就必能意识到，有害之事发生就必能觉察到，从而能够走对路、做成事。这句箴言强调了守住内心的重要性，其所包含的“正心”思想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

中国古人历来重视心的修养。新儒家学派的徐复观认为，心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特性，中华文化的价值根源来自人心，而非外在的神或权威。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是主观的、唯心的。恰恰相反，心作为价值根源，正是要通过克服私欲、成见等主观性，使客观事物不受歪曲而原原本本地进入心中，从而使人们明辨是非利害，从而做事无不成。这种理念使得中华文化高度强调内心世界的美好状态，在个人修养上追求一个不被主观偏见和私利贪欲所污染的澄明之心，在政治理想上追寻“内圣外王”的王道社会。这种对澄明之心的追求最早在《礼记·大学》中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学》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提出“正心”是儒家进行道德修养和立身治世的基本步骤之一。纵观

历史，“正心”为历代所推崇，至宋明理学尤甚。从汉时董仲舒《士不遇赋》所云“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到晋代傅玄“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再到宋时程颐“进修之术，莫在于正心诚意”、朱熹“万世学者之准程也”，无一不彰显正心作为道德修养方法的重要性。

正心是刀刃向内的自胜之功，本质上是自我约束、自我管控，是自律自守。明正德十三年正月，王阳明奉命剿灭山贼。出征前，他给弟子薛侃写信道：“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破心中贼之所以难，是因为外界对人的行为和思想施加的影响终究有限，要想根除恶念、清正自守，还是要靠自我约束。意诚而后心正，只有自胜的意念真诚、自我约束的信念坚定，才能正心明道，否则只是自欺欺人。老子《道德经》所谓“自胜者强”，正是因为自胜者有强大的自制力，因此能干事、能成事。

正心自守，就要克服不良情绪。《礼记·大学》在解释“正心”时指出，愤怒、恐惧、好乐、忧患七种情欲会扰乱人心，从而使人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利欲贪念之乱心，是通过侵蚀人的良知使人妄思妄动，生出攀比、享乐等种种杂念，最终被私欲冲破底线，走向堕落。个人情绪的乱心则分为两种，一种是毫无定力、轻易受外界影响，深陷一时的情绪而乱心，最终冲动行事，悔恨一生。另一方面是公私不分，被私情裹挟而乱心，最终与人同流合污、徇私乱纪。正心自守要克服情绪的影响、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宰相裴度在中书省任职时，一次酒宴上随从慌忙报告官印丢了，在场听到消息的官吏无不大惊失色，裴度却气定神闲、泰然自若。一会儿，随从报告说官印又复归原处，裴度闭口不言。有人问裴度为何毫不惊慌，他答道：“官印并不值钱，偷盗官印的人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伪造文书。如果急忙寻找，就会打草惊蛇，让嫌犯毁印

灭迹。如果不急着追查，等到犯人伪造文书之后，自会放回原处。”裴度失印不惧，不像随从一样被忧患情绪裹挟，真正做到了“心不乱”，因此能明辨是非，最终查明并捉拿了盗印者。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遇事不避、做事不拖、临危不乱。平日里，懈怠、懒惰、忧虑等情绪无时无刻不侵袭着人的内心，若让情绪占了主导，则或冲动犯错，或好逸恶劳，或无病呻吟，或无所适从。只有正心明道，才能避免情绪的干扰，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正心自守要克服利欲贪念，保持良知。古时所谓的“灭人欲”，多指消灭违背天理人伦的不合理欲望，而非消灭人的基本需求。清初思想家唐甄说：“人之情，孰无所欲！得其正而安之，不得其正而弃之，是为君子。”正心明道，不在于无欲，而在于慎欲。节制自己的欲望，支持合理的欲望，抛弃不当的贪念，心才能正。历朝历代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腐斗争，但贪腐现象屡禁不止，国蠹层见叠出，就是因为总有人抵不住诱惑，被不正当的欲望一步步蚕食良知、夺舍身心，最终以权谋私，犯下累累罪行。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劝谏唐太宗“十思”的第一条就是“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可见慎欲对正心明道、为政治国都极其重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知道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那所谓慎欲知足。慎欲知足，才能够把自己的心稳稳地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不让多余的欲望扰乱内心、侵蚀良知、破坏防线。

正心自守是坚守底线、不徇私情，而非无情无义。汉代苏章为官清正、公私分明。他在任冀州刺史办案期间，发现自己的旧友在担任清河太守时犯了法，于是他设宴款待旧友，二人共叙平生之好，不谈犯法之事。旧友十分高兴，认为苏章在打包票给自己当保护伞，说道：“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苏章一听，立刻严肃地说：“今晚我苏章是因为朋友之情和你喝酒，明天我冀州刺史则是秉公执法、公事公办”。次日，苏章果然不徇私情，将旧友按律治罪。从此，众人

皆知苏章是个公私分明的好官，对他恭敬有加。由此可见，正心自守不是无情无义、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讲人情但不徇私情、重感情但更重原则。多少贪腐因私情而起，多少底线因私情而松。必须划清友情、亲情等私情的界限，守住亲情关、交往关，使人情暖心而不乱心，才能正心明道、拒腐防变。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正心自守之所以难，只因侵蚀良知的念头常常是微小的、难以被发现的。一言一行皆能显现人的思想，小事小节皆能体现人的品质。《尚书》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底线的松动、原则的动摇，往往始于一件小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拒腐防变的防线一旦出现裂痕便会很快被摧毁，正如登山一旦失足便会不断坠落。因此，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必须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权力再小，不可谋私；蝇虫蚁腐，其害如虎。再小的利欲只要防不住就会乱心，就会一点点侵蚀干部的理想信念。再小的贪腐只要发生，就会污染党政形象、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获得感。因此，正心自守要格外注意慎微，莫让小利破了底线，莫让小恶毁了前程。

“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提醒人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心正则情欲不侵，内心清静澄明，也就能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清楚地看到事物的利弊，在有利之事发生时及时发现、支持其发生发展，有害之事发生时保持定力、沉着应对。《朱子语类》云：“心者，万事之原也。人之一心，得其正，则事事皆得其正。心或不正，则无一事得由于正。”只有正心明道，克服私欲私情、守住底线防线，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走对路、做成事。



（上接1版）再比如长征过雪山途中军需处长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曾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关于我们党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科学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这些要求涵盖根本保证、根本目的、根本遵循、战略目标、主攻方向、有效途径、重要着力点、重要抓手、强大动力，既有战略安排又有工作部署，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构成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顶层设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新征程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科学行动指南。

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党的事情要办好。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在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管党治党全部工作之中，确保党牢牢把持全面从严治党的主动权，确保党的自我革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党的二十大发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动员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显著优势，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理念、找思路、找方法、找举措，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科学性、有效性。

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聚焦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个战略性问题，不断进

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及时清除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以解决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要求，聚焦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紧紧围向“六个如何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既常抓不懈，又集中发力，在不断解决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党优势，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任，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把全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使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强化政治功能，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打造一支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纪检监察铁军，为更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作风作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我扬弃、自身跨越。

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依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实现自我监督和自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开创新局面。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原主任）